



陶天翼 教授

---

紀念專刊



# 陶天翼先生行述 (1929 ~ 2015)



## 陶

天翼先生，籍貫中國浙江紹興，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生於中國上海市，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美國加州紅木城 (Redwood City)。

陶天翼先生是陶百川、張素君夫婦的長子。陶百川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中國國民黨先進長老。陶先生早年在上海讀書，抗日戰爭期間由上海經由浙江國軍控制區轉入大後方。抗戰勝利後返回上海，就讀於南匯中學。

一九四九年四月陶先生隨家人經香港到達臺灣，不久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與許倬雲、管東貴、李卉（張光直夫人）等同班。本科畢業後繼續攻讀研究所。一九五七年研究生畢業後，他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在三年，他對兩個目做了研究：太平天國和中日甲午戰爭，並曾當面向胡適先生請益指示研究途徑。

一九六〇年秋陶先生遠赴美國，就讀於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師從顧立雅 (Herlee Glessner Creel) 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專攻中國古代史。在校期間，陶先生得到錢存訓先生的幫助，並與連戰、許倬雲、馬伯良 (Brian McNight)、崔永浩 (Choe Yong-ho) 同窗。在就讀博士生時，陶先生擔任研究助理，協助顧立雅、William



陶百川、張素君夫婦及其子女 (自左至右)  
長子天翼 (任職於美國夏威夷大學)  
次子天宇 (任職於美國 IBM)  
五子天林 (任職於臺灣中和資訊管理顧問公司)  
女兒天文 (任職於美國史丹福大學)  
三子天放 (任職於美國海軍研究院)  
(民國四十五年攝於臺北)

陶天翼先生家族舊照

Hardy McNeill 等教授的學術研究著述。一九七二年陶先生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題目是 *The Recruitment of Officials on Grounds Other Than Ability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205 B.C.-8 A.D.*。

一九六八年陶先生受聘到夏威夷大學歷史系任教，開始了在夏大長達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並成為夏大歷史系的終身教授。陶先生的學術研究重點是中國漢代歷史及古代官制、特別是前漢王朝的人事制度，以及東亞古代史。陶先生曾開設多種本科與研究生課程，包括遠東文明史、中國古代史（漢初至唐中期）、中國史料學，撰寫了《日本信史的開始》專書和多篇學術論文，並指導碩博士生



一九九〇年三月於夏威夷為友人及同事歌唱





一九九〇年二月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召開的東亞民族主義會議代表合影（左三為陶天翼）

多名。陶先生指導過的博士研究生當中有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邢義田和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東方。

在夏威夷大學期間，陶先生接待了許多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訪問學者，其間與來訪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劉家和教授結下深厚的友誼。

一九九九年陶先生離開夏威夷大學，前往臺灣照顧年邁多病的父母，與父母同住於臺北新店中央新村，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任教，並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陶先生的父母陶百川、張素君夫婦於二〇〇二年八月九日和八月十六日因病僅距七天相繼去世。

二〇〇四年八月陶先生從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榮休，返回美國夏威夷，後住入當地老人院休養。二〇〇九年經其妹陶天文（史丹福〔Stanford〕大學醫學院榮休教授）安排，搬遷到加州紅木城的老年療養中心，得到周詳的看護。

在加州紅木城安度晚年的六年休養中，陶先生的妹妹陶天文教授經常關心照顧他的生活，他的學生邵東方曾多次前去看望他，陶先生本人也幾次到史丹福大學校園觀光及東亞圖書館參觀。陶先生在夏大歷史系的美籍韓裔同事暨友人

崔永浩教授和姜希雄（Hugh H.

Kang）也曾分別致函問候他。在

去世前的七個月，陶先生還特別

與老同學許倬雲教授通了電話，

共敘舊誼。

二〇一五年三月陶先生不幸

去世，享年八十六歲。陶先生終

生未婚，有三個弟弟（天宇、天

放〔已故〕、天林）和一個妹妹

（天文）。



陶天翼先生與學生邵東方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於美國加州



# 憶天翼兄

劉家和／撰 邵東方／註

劉家和／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名譽理事長  
邵東方／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史丹福大學圖書總館顧問

天生至性<sup>1</sup>，善與人同<sup>2</sup>；恭行有恥<sup>3</sup>，淡泊<sup>4</sup>謙沖<sup>5</sup>。  
深思洽覽<sup>6</sup>，萬卷盈胸；檀香振鐸<sup>7</sup>，海雨天風<sup>8</sup>。  
與君論學，莫逆於中<sup>9</sup>；不諼<sup>10</sup>君子，思我陶公。

二〇一七年三月廿三日，丁酉年二月（癸卯）廿六日（己酉）。

## 邵東方補註：

我在北京師範大學求學階段的恩師劉家和先生曾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七年三度訪問夏威夷大學。在夏大期間，由於性情相同、理念接近，劉先生與陶天翼先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尤其是在一九九一年夏天劉先生在夏大長達三個月的訪學時期中，陶先生與劉先生更有機會經常聚首，兩人暢談人生經歷，商討古史學術研究。他們常在校園內的大榕樹下晤談數小時，並在海濱一同放聲歌唱熱愛祖國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和夏威夷民歌「珍重再見」。其時陶百川老先生也在檀島休養，劉先生專門向老先生致以敬意。劉先生回國後，陶先生與劉先生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一直到陶先生病重才停止。

1 至性：指天賦的卓絕品性。《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三國·魏·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德性》：「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

2 善與人同：指與人共同做善事。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孟子·公孫丑上》）

3 恭行有恥：孔子曰：「行己有恥。」（《論語·子路》）  
「恭行有恥」謂自己恭行實踐，可恥之事不為也。

4 淡泊：即淡泊名利，不追求名利才能使志趣高潔。《東觀漢記·鄭均傳》：「好黃老，淡泊無慾，清淨自守。」三國·蜀漢·諸葛亮《戒子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5 謙沖：謂謙虛和順。《晉書·姚興載記上》：「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唐·楊炯《大周明威將軍梁公坤神道碑》：「因心孝友，宜於自然；率志謙沖，得乎所性。」唐·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6 洽覽：即博覽。漢·應劭《風俗通·十反·司徒梁國盛

允》：「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晉書·束皙傳》：「潛朗通微，洽覽深識。」

7 檀香振鐸：「檀香」指夏威夷大學，位於美國夏威夷州檀香山。「振鐸」，《論語·八佾》：「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朱熹注：「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此句指陶天翼先生在位於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學執教多年。

8 海雨天風，又作天風海雨：語出唐·孟郊《出門行》「海風蕭蕭天雨霜」。宋·蘇軾《鵲橋仙·猴山仙子》：「銀河微浪，尚帶天風海雨。」此處形容夏威夷的地理氣候特點。

9 莫逆於中：中與衷通。衷又可作「衷心」解，例如「和衷共濟」。此處變「莫逆於心」為「莫逆於中」，乃為押韻之故。語出《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此句描述陶天翼先生與劉家和先生的深厚友情。

10 不諼：不忘也。諼，音 xuān。《詩·衛風·淇奧》：「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毛傳》：「諼，忘也。」唐·韓愈《江漢答孟郊》：「何為復見贈，纏繞在不諼。」

# 憶恩師陶天翼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院士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一 九七五至一九八〇年在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從恩師陶天翼讀書，轉眼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回憶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歷歷猶在目前。一九七五年到夏大後先向系裡報到，系中秘書即帶我至陶師和羅馬史老師施培德教授（Michael Speidel）處。因為我申請時即已言明來此地是以研讀秦漢和羅馬史為目標，並準備以秦漢和羅馬帝國的比較為研究領域。那時東西文化中心鼓勵學生朝東西文化交流方向努力，因此我能順利獲得東西文化中心和教育部合頒的全額博士生獎學金。當時僅憑一股理想，完全不知這樣的研究有多大的風險和困難。老天眷顧我，見面後得知兩位老師都是謙謙君子，彼此是極要好的朋友，他們都以極友善的態度引領我進入這一艱難的領域。

尤其是和陶師第一次見面的印象，至今無法忘懷。研究室不大，堆滿了書，陶師個頭中等，但體形不小。進門即見陶師的笑容撲面而來，大而有力的手掌握著我，感覺到強大的力道和溫暖。他慈祥、熱情又溫暖的言語立刻使我忘卻了進門前的緊張，我知他在芝加哥大學師從當時中國中古史的權威顧立雅教授（H. G. Creel），許倬雲先生也曾是他的門生。我在臺大時從倬雲師讀上古史，也因倬雲師的推薦信才拿到獎學金。聽陶師說，他和許先生是很好的同門師兄弟。或許因為這層關係，陶師對我照顧無微不至。初來乍到，諸事不懂，語言也不夠用。因為陶師在課業和生活上諸多指引，我才能較快地進入情況，準備第一學期的上課。

博士班的課，修課學生不多。陶師的課只有二三人。我以初生之犢走進教室，完全摸不著美國大學的上課方式，甚至不知如何到圖書館找規定要閱讀的書。每次在圖書館書架旁為找不到著書而苦惱，心裡納悶為什麼教授指定要閱讀的書都找不到？都已被同學借走了嗎？有一天遇見陶師，他即帶我到指定書區找書。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所有課程經開課教授指定閱讀的書，都放在特定的一區，只能在圖書館閱讀，不得外借。這是件極小的事，對我卻解除了極大的焦慮。

一學期結束，交了期末報告。第二學期前，陶師大概是見到我須在羅馬、希臘史上苦讀，竟然很客氣地對我說他看了我的秦漢史報告，覺得我應將更多時間集中在希臘、羅馬史以及拉丁文的學習上，可以不必再修他的課。因為他的課針對一般美國學生而設計，對我太淺了些，再花時間沒有益處。沒想到當時乖乖聽從陶師的話，此後四年在夏大竟然沒有再修他的課。如今想來，陶師當時完全不顧自己學生太少的處境（當時系中規定教授授課必須有一定修課人數，能有多少學生修課會列入考核，有些老師被迫拉學生上課），完全為學生的需要而設想。當時我不能明白他為何不要我修課？他是我的指導教授啊！後來明白時，已來不及彌補。因為陶師的無私和寬容，我才得以用盡全力在西洋古代史方面，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學業。

第二年，維紅也到了夏大，陶師對我們夫妻的照顧就更多了。如何上超市買菜，超市何時減價，如何坐公車到 Ala Moana 等地購物，都是陶師費心的範圍。每次在 Ala Moana 購物完，師生同致樓下吃中餐快餐。我們想請陶師，總被拒絕。我們後來搬出 Hale Manoa 宿舍，在外租屋，想請老師來家便餐，竟一次也不得如願，反而被他請客不知多少次。後來聽羅錦堂師以及好多和陶師同輩的朋友說，才知被拒絕的人不止我們，而被陶師幫助的朋友學生不知凡幾。但是我知道陶師待己極為節儉，每天到學校步行來回，手上提著二明治膠袋。周末去 Ala Moana 買餐必等快餐減價時刻到了才下手。寬以待人，節儉以律己，真的再不曾見過比陶師更奉行徹底的人了。記得唯一一次能請到陶師作客，是我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在外奇奇一家中餐館，師生慶祝了一番。

往事已矣，如今想來，仍充滿溫馨和無限感謝。四十多年了，當大家決定紀念陶師，忍不住下筆留下對陶師的懷念和感恩，雖然我的經驗和凡與陶師交往過的師友可能並無兩樣。



# 遲來的悼念—— 懷先師陶天翼先生

邵東方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  
史丹福大學圖書館顧問

今 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我敬愛的老師陶天翼先生辭世兩週年。在華藝數位有限公司常效字總經理和華藝學術出版社雅雅竹總編輯的大力協助下，紀念陶天翼先生在線專刊得以在華藝學術網站（[www.airiti.com](http://www.airiti.com)）開通，以供陶先生的生前友人和弟子發表有關他的照片和文章，表達對他的深切懷念。

在這篇回憶文字開始之前，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題名為「遲來的悼念」。

二〇一六年聖誕節前夕，我在華府給陶先生晚年居住的加州舊金山灣區紅木城（Redwood City）老年家庭式休養中心（CLM Home Care）打電話，準備向陶先生恭賀聖誕節和新年快樂。不料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回答道，陶先生已經於去年（二〇一五）去世了。聽到這一不幸消息，感到很突然，竟一時難以接受。我連忙詢問陶先生去世前後的情況，工作人員以個人隱私不便透露為由，要我直接與陶先生的家人聯繫。

我於二〇一二年四月離開加州來到華府後，曾於二〇一四年八月二日和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兩次到紅木城看望陶先生。在我最後一次去看望陶先生時，他在中風之後身體十分虛弱，雖然心裡很明白，也有表達的慾望，有時卻說不出來，他的記憶力也有所下降。我當時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可是想到陶先生的家庭有長壽基因，他父母都活到百歲上下，便稍微釋然了一點，內心默默祝福陶先生能夠早日康復。在那之後，由於種種原因，我一直未與陶先生聯繫，所以遲至他去世一年多後才知道。

陶先生終身未婚，他晚年在附近的唯一親人是

他的妹妹陶天文女士。陶天文女士退休前是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陶先生退休後從夏威夷州搬到加州，全是陶女士悉心安排的。由於我手頭沒有她的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便馬上給原來在



二〇一四年八月於美國加州紅木城



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工作時的同事薛昭慧女士打電話，請她代為查詢。薛女士十分認真，很快就通過短信發來了陶天文教授的電話號碼。在幾次未能打通電話後，我又請薛女士通過電子郵件聯繫陶女士。不久我就收到通過薛女士轉來的陶天文教授的電子郵件：“Dongfang, thank you so much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於美國加州紅木城

for your kind thoughts about my brother. He always appreciated your warm friendship!”（非常感謝你對於我哥哥的深切思念。他生前一直感念你溫馨的友情！）她告訴我，陶先生是於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去世的。聽後我的心情頗為沉重，為未能及早知道陶先生去世的消息而深感遺憾。陶天文教授在隨後回覆我的電子郵件中充滿深情地寫道：“Dongfa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caring. I am sure that Tien-yi always enjoyed seeing you and appreciated your visits. You are the kind of students who ‘inspire’ people to become teachers!”（非常感謝你的關切。我確信天翼生前見到你很高興並感激你的來訪。你這樣的學生會「激勵」人們去當老師！）陶女士的這番話稍稍平復了我的沉痛心情。

陶先生去世近兩年了，我始終無法擺脫對他的思念，沉在記憶深處的往事一幕幕浮現出來。下面我將回顧我們師生交往的點點滴滴，讀者或許能從中瞭解到陶先生的為人處世。

我第一次見到陶先生是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而最後一次見面交談則是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儘管已事隔二十八年，但我和陶先生第一次見面的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一九八六年夏威夷大學（簡稱夏大）新學年開始之際，作為新入學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友人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先生的陪同下到歷史系報到註冊。在與系主任郭穎頤教授、系研究生主任 Ray E. Cubberley 教授及幾位行政人員見面後，一位中年華裔學者出現在系辦公室，郭教授向我介紹說這位是陶天翼先生，教授中國古代史。陶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

他微胖的身材及溫和的笑容。他一望即是平易近人的謙謙君子，而不是中國傳統中所謂「望之儼然」的師道尊嚴形象。陶先生在得知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生後，便非常熱情地和我聊了起來。來美國之前，我已經從恩師劉家和教授那裡得知陶天翼先生的大名，因為劉先生於一九八六年春天訪問匹茲堡大學期間，結識了歷史系的許倬雲教授。當我提及此事時，陶先生說他和許先生是五十年代在國立臺灣大學（簡稱臺大）歷史系非常要好的同學。初次談話雖然時間不長，但卻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開啟了我們在夏威夷七年多的師生關係以及後來多年的師弟情誼。在這些年中，我們之間交往頻繁，不但思想上彼此瞭解，而且情感上也相互信任。

懷念陶先生，最重要的是學習他的高風亮節。在夏大求學的七年多時間裡，我不僅從陶先生那裡學到了治學方法，也從他身上獲得了很多人生的感悟。陶先生一生或許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我所接觸到的也都是些教學和日常生活中的瑣事。然而滴水見太陽，這一件件小事卻在在體現了陶先生的性格和品德。《論語·學而》描述孔子接人待物「溫良恭儉讓」，這五德是儒家提倡的行為準則。余英時先生曾對新儒家在理論上陳義高遠，而實踐中卻和常人無異感到失望。相比之下，陶先生雖從不高談闊論儒家學說，但他的工作和生活卻處處顯示出溫和、善良、恭敬、節儉和忍讓。應該說這五種美德都來自於陶先生「誠於中而形於外」內在心灵的修養。

先說「溫」。所有接觸過和認識陶先生的人都會深深感受到他為人的溫柔敦厚。他待人不分長



幼，都是禮貌周全。對於我這樣的後生晚輩，他從來不擺架子，一向是彬彬禮待。每次下課後，他總是堅持開門先送每一位學生走出教室，自己最後離開。很多訪問夏大受到陶先生接待的學人都會感到他的熱忱和真摯。他總是不辭辛勞地往返機場接送到訪夏大的學者，而且每人在臨走前都會收到他贈送的夏威夷特產堅果（Macadamia Nuts）巧克力。夏大哲學系有一位教授外出旅行，經常叫陶先生送他去機場。陶先生總是提前到他家樓下等候，有好幾次竟等了兩三個小時，可是陶先生卻毫無怨言。陶先生的「溫」，絕非矯飾的虛偽，而是他內心和善仁慈和真實誠懇在態度言行上的自然流露。

次說「良」。陶先生心地純淨，為人善良，有著寬厚仁慈的天性。我與他相處多年，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的場合，他都絕對不說別人的閒話。他總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我記得有一天晚上，陶先生在開車時發現前面的一輛車沒有開車燈，在黑暗中快速行進，這是非常危險的。於是陶先生加快車速追趕這輛車，並連續按喇叭警示他。可是這輛車的司機誤解了陶先生的好意，竟打開車窗，向陶先生伸出中指。儘管對方對他如此無禮，陶先生還是緊追不捨，並不時以變換車燈的強弱光作為提示，直到對方覺察為止。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我剛在夏大上課時，感到學習壓力很大，不僅是英文閱讀寫作的困難，更是對研討課（seminar）的教學形式及課下安排的大量閱讀和每週遞交讀書報告很不適應。在第一個學期，我除了每週擔任二十個小時的助教工作（用英文給美國學生上輔導課，對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選修了四門課（十二個學分），其中有陶先生的中國古代史研討課。當我問如何準

備這門課時，出乎我的意料，陶先生說：「你不要過於在我這門課上花費時間，只需要按時聽課，在期末交一篇報告即可。」當時我聽了他的話有些不解，怎麼一個教授的學業要求這麼寬鬆。後來在聊天中陶先生告訴我，「作為剛從國內來美國的學生，壓力一定很大。美國教授的課通常要求高、難度大，所以我的課可以給你和其他中國大陸新生作為緊張學業上的一個緩衝。」陶先生對學生的體貼入微、關懷備至，深深打動了我。其實陶先生的這門課內容非常豐富，而且架構嚴謹，我聽了一學期的課，不禁深深欽佩他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教學經驗。然而，這種關心並不等於放任自流，陶先生也絕不是沒有原則的濫好人。記得同班有一位來自香港的學生，他目空無人，缺乏對老師的尊重，經常無故缺課，到了期末也不上交學期報告。陶先生按照規定給了他一個「不及格」。儘管事後這個學生還無理取鬧，到院系申訴，要求改分。但陶先生堅持原則，不顧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某些人的說情，堅持不更改分數，從而遵守了教學規定並維護了學術尊嚴。

三說「恭」。「恭」包括了人的外表和內心兩個方面。陶先生的為人處世恰恰體現了外在的恭和內在的敬。對他而言，地位和名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保持自己內心的平靜。正是出於這兩點，陶先生總能平心靜氣、循循善誘地與同事和學生討論學術問題。這種內心和外在的統一還表現在陶先生的行為低調和從不炫耀。他從未利用父輩的關係和影響為自己爭取方便。陶先生的恭敬，還體現在他對學術研究、教學工作和人生理想的深深敬意。例如，他和劉師家和先生曾經多年互

致聖誕新年賀卡，而每次他都說剛剛交了學生的成績表，然後就是熱情洋溢的友情回憶與祝賀。最初劉先生有點不解其故，後來終於明白，陶先生是敬業在先，然後再敘友情。「在貌為恭，在心為敬」這句話用在陶先生身上恰如其分，沒有絲毫的誇張。

四說「儉」，每個人的生活都應該有一個度，即儉約而不奢侈，超過即奢侈，不及即吝嗇。《左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見古人就把奢侈浪費視為一種惡行。陶先生在生活上秉持了節儉的美德，多年一直開著一輛福特牌（Ford Escort）的小型手排擋的汽車，長期居住在喧鬧的一間臨街公寓裡。除了滿房間的書籍外，他家裡幾乎沒有任何奢侈品。這與經常開著高檔新車、炫耀豪宅的一些華人暴發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在他眼裡，儉樸的生活也是對自然的愛護和對社會的崇敬。然而簡約並不意味著吝嗇。陶先生雖然自己十分勤儉節省，卻常常請學生們吃飯，對遠方來客的招待更是慷慨大方。記得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父母到夏威夷探親期間，陶先生曾多次宴請他們。他看到我父母在點菜時很注意價格，盡量點最便宜的菜，馬上用手遮住菜單的價格部分，而且在他們點完後，他又多要了最貴的海參和魚翅湯。三位老人相互謙讓的場面令我記憶深刻。

五說「讓」，讓指謙讓、禮讓，相對於「爭」而言。在美國這樣一個提倡競爭的社會，往往「一爭奪生而辭讓亡」，陶先生特立獨行，處處謙讓，有時就被視為不合時宜，吃虧不利己，但他對此毫不介意。我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個人電腦還是十



分昂貴的電子設備，學校開始陸續給歷史系的教員們配置個人電腦。每位教授都希望儘早分到一臺新電腦，而陶先生則總是讓別人先領取，他成了全系中最後分配到電腦的教員。在陶先生看來，減少個人的物質慾望，可以使心情平靜安寧，更好地沉浸在讀書和思考之中。他也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真正做到不與人爭名奪利。有許多人自詡置名利於身外，而碰到實際利益問題，卻無法擺脫世俗現實。陶先生在夏大擔任助理教授很久後才升為副教授，但他從來不跟系主任和教授同仁爭取升等名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有一顆謙讓的心。因此當他遇到與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時，往往能夠保持豁達淡然的心態，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來稱讚陶先生，絕非過譽。在他看來，生活平和，內心才能通泰幸福。然而「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處不敢讓也」，陶先生的事關正義公平的原則問題上是決不退讓的。在離開夏威夷之後，有一年我回夏大見到陶先生，他告訴我，有人不久前向校方誣告他在教東亞文明課程時態度不認真、教學質量很差。對此陶先生非常氣憤，立即向文學院院長申訴抗爭，他要求任選一位歷史系教東亞史的教授去聽他講課。為公平起見，他還要求再另請一位其他系東亞研究的教授旁聽他的課，以作出公正的評估報告。歷史系研究韓國史的崔永浩教授和宗教研究系研究中國佛教的 David W. Chappell (1940~2004) 教授在聽了陶先生的課後，向校方寫出了評估報告，對他的講課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最後校方撤銷了對陶先生的錯誤評判。後來我們才知道，正是由於陶先生教課認真，在評定學生成績上一絲不苟，公平負責，所以個別曠課不用功、得到低分的學生心懷不

滿，向校方告了黑狀。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主張的「溫良恭儉讓」是中華民族道德的根本公序良俗，對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影響無遠弗屆。可是進入現代社會後，中國社會受到西方競爭觀念和鬥爭哲學的影響，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認同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很少有華人堅守這五德作為自己修養的標準。「溫良恭儉讓」成了過時和迂腐的道德教條。在當下人情世故的大環境中，陶先生特立獨行，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真正實踐了儒家的聖人之德，他堅守「溫良恭儉讓」的人生態度在當今旅美華裔學者中幾乎無人可及。必須指出的是，陶先生的高尚品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環境。陶先生常提到父母對他五兄妹的言傳身教，自幼勉勵他們敦品勵學。正如陶天文教授所說的：「我們的父母諄諄教導我們如何成為奉獻者而不是索取者。」（Our parents taught us well in how to be "givers" instead of "takers."）。正是得益於父母的教養有方，陶家「五子登科」，各有建樹，成為品學兼優的棟樑之才。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離開夏大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簡稱國大）任教。由於陶先生與我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之間的聯繫沒有中斷。我每次回夏威夷開會或旅遊，總要去看望陶先生。在一九九九年辭去國大的教職後，陶先生熱心地為我寫求職推薦信，還專門寫信鼓勵我申請夏大歷史系的教職。二〇〇二年九月，友人李紀祥教授邀請我到臺灣宜蘭的佛光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陶先生為了照顧居住在臺北的年邁父母，於一九九九年從夏大退休回到臺灣。他先是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從事研究，後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於美國夏威夷檀香山

來在友人張鏡湖先生的推薦下到中國文化大學（簡稱文大）任教。二〇〇三年四月的一天，兩位畢業於文大的同學陪我前往陽明山看望陶先生。我們走在文大的校園裡，大部分學生都認識慈祥和藹的陶先生，見到他都親切地叫著「陶爺爺」。

陶先生於二〇〇四年八月從臺灣退休回到夏威夷後，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我又利用到夏大參加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年會的機會拜訪了陶先生，陶先生像以往一樣請我在校園附近中國餐館吃晚飯。他向我談了退休後的生活，尤其說到他的一个姪女到檀香山工作，給予他諸多幫助和照顧。



在此後幾年裡，我則很少聽到陶先生的消息。直到二〇一〇年四月的一天，我正在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上班，忽然有同事過來說，有一位華裔老人要見我。當我走到圖書館前臺，一眼看到陶先生站在那裡。我喜出望外，忙問他怎麼會來到這裡。原來陶先生因年事已高，孤身一人在夏威夷生活不方便，在他妹妹的安排下，搬到加州住進了史丹福大學附近的老人中心頤養天年。因為陶先生知道我在加州工作，那天中心組織老人們到史丹福大學參觀，他專門來到東亞圖書館看我。這真是一次意外的相遇。自那次會面後，每逢節日假期，我都去陶先生的住所探望他，有時還請他和妹妹陶天文教授到史丹福大學校園聚餐。

在陶先生身上，有一種讓我敬重和向往的學人風度。我的前輩友人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先生曾說：「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話。」陶先生就是這樣的人，凡是人們問到他在做什麼的時候，他總是回答在讀書。他愛職敬業，確確實實把一生奉獻給了教育和學術。除了讀書、沉潛於學術的海洋，陶先生還時常到教堂參加合唱團的活動。他就是這樣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執著、沉靜、純粹。

近兩三年來，我在美國的老師輩友人陸續凋零。倪德衛 (David S. Nivison) 教授於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辭世，趙復三教授於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逝世，我應他

們家人的邀請分別在倪教授的追思會和趙先生的葬禮上致悼詞。可是陶先生則是默默地離開了我們，沒有舉行任何悼念儀式。這好像就是他終身為人處事的最後體現——行事低調、甘於淡泊。

敬愛的陶先生已經悄然離去，但他「溫良恭儉讓」的高潔風範卻讓人難以忘懷，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感化著我和像我一樣師從陶先生的弟子們。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脫稿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二〇一〇年六月於美國史丹福大學校園



# 附錄一： 關於日本史的開始

劉家和

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名譽理事長

陶

天翼（1990）。《日本信史的開始》。臺北：三民書局。

有文字記載的日本歷史始於何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過，有關日本歷史的最早的文字記載，不是出現於日本本土，而是出現於其鄰邦中國。這正如有關日耳曼人歷史的最初文字記載並非出現於日耳曼而是出現於羅馬一樣。因此，陶天翼先生所著《日本信史的開始》一書首先確定中國史籍中探究日本歷史的最早的文字記載，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可是，在公元七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文獻中只有倭而無日本。那末，倭與日本到底是什麼關係呢？這就成了作者在此書中著重論證的關鍵問題。正如作者所指出，在此書以前，日本已有學者對倭即日本的問題作了論證（《日本信史的開始》，第57-58頁。）他們的努力說明了倭可能就是日本，而作者在本書中則用豐富的史料和嚴密的推理確證了這一點。

中國文獻最早說到倭人的是公元一世紀後期班固所著《漢書》。當然，成書早於《漢書》的《山海經》中已經提到了倭。不過，司馬遷作《史記》時即對《山海經》一書內容的真實性有所懷疑，因而不曾引其材料。為了慎重求信，作者也以《漢書》為最早記載倭人歷史的文獻。《漢書》對倭人雖然語焉不詳，但是寫成於漢與倭人剛有直接接觸（光武中元二年倭使來朝）之後不久，所以其記載具有重要價值。這樣作者就確立了一個可靠的基點。

自《漢書》以下。作者歷舉了《後漢書》、《三國志·魏志》、《晉書》、《南史》、《北史》、《宋書》、《南齊書》、《梁書》、《隋書》及舊、

新《唐書》等史籍中有關倭人的記載。這些記載說明，中國自漢至唐初一直以倭稱今之日本，直至倭自身改稱日本以後。中國文獻才也做了更改。

作者不以徵引中國歷史文獻為滿足，又詳引韓國有關倭國的史料，主要是成書於公元十二世紀中國葉的《三國史記》。此書所載史料可以與中國文獻相印證。而且所記倭國史事頗詳於中國史書，可以補後者之不足。考慮到《三國史記》有成書較晚的弱點，作者又很重視第一手史料的探研。他不僅重視公元五世紀的《好大王碑》這樣直接傳世的第一手史料。而且精心從《三國史記》中輯出公元六六五年新羅和百濟二國所訂立的盟約原文及公元六七一年新羅文武王復大唐總管薛仁貴的信這樣的第一手史料。他以第一手史料與第二手史料相契合、相印證的方法，提高了《三國史記》有關倭國歷史記載的典據性。

當然，作者不會忽視日本本國方面的歷史文獻。他提到《日本書記》等六部日本國史。這些史書編纂於公元七二〇年在年至九〇年在一一年之間，所記自神話傳說時代至公元八八七年。作者提出，這些書一是研究日本古代史最重要的文獻。不過六部國史都成書於倭國已經改名為日本以後。六部國史裡日本已不再稱自己為倭，也沒有提自己曾經稱為倭。倭字雖常出現。不過，倭是一個地方級的行政單位，不是代表全國的國名。」（見本書第53-54頁）針對這一複雜情況，怎樣證實中國正史裡倭是今天的日本呢？作者作出嚴密的分析和論證，其論證有以下四點：

一、作者指出，從中國與朝鮮的史料來看倭的位置和狀況，它只能是今天的日本列島。



中國正史自《後漢書》以下以至《舊唐書》，都說倭在朝鮮東南大海中，首先地理方位相符；同時又說明是遠在大海中，從而排除了為近海其他小島之可能；繼則又說明倭的地域甚大，故非日本群島莫屬。朝鮮方面有關倭的地理方位的史料可以為中國史料之佐證，而朝鮮史料在說明倭為大國方面則遠較中國記載為詳。日本的地理方位與狀況古今並無多大差別，所以既然中、朝兩方史料所記倭的地理情況與今日日本群島相符，那末倭雖不能說就等同於今天的日本，但它就在今天日本境內是無可置疑的。

二、作者以中、朝史料中的倭與日本史料中的日本相校核，指出二者只是一國的二名。

例如，中國的《北史》和《隋書》記載大業四年（公元六〇八年）裴世清（或作裴清）曾隨日本使節小野妹子訪問倭國，朝鮮《三國史記》於同年亦有同樣內容的記載。在日本的《日本書記》中，同年也有相應記載，而且記事比中國史書為詳。又，中國《舊唐書》記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唐遣使者高表仁訪問倭國。《日本書記》同年亦記此事。記載尤較中方記載為詳。中國（及朝鮮）史料中明言裴、高二人先後訪問對象皆為倭國，而《日本書記》則但自稱為日本，而不稱倭。既然裴、高二人先後所訪為同一國，而不同國家史料對此國竟有倭與日本兩種不同稱呼、作者由此證明、倭與日本只能是一國之二名。

三、既是一國，為何又有不同的二名？作者又征引史料，說明這是倭國自改其名為日本的結果。

中國《新唐書》記，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在年），倭國來唐使者「惡倭名，更號日本」。

《舊唐書》中也有「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之說。朝鮮的《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中也記載，文武王十年（公元六七〇年在年），「倭國更號日本」。所以，倭國改名日本，在中國和朝鮮史料中是有確實證據的。至於改名的時間，儘管中、朝兩國史料都說明在公元六七〇年，作者仍然採取極為審慎的態度。因為這很可能是中、朝兩方知道倭國改名的年代，而非其本國實際改名的年代。作者發現，《日本書記》雖未記倭國改名日本之事，但是其所記大化元年、二年（公元六四五、六四六年）的詔書中是明確自稱本國為日本的。鑒於大化革新是日本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作者推定改名當在公元七世紀中葉。是否有可能更早呢？作者指出，《隋書》所記大業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倭國使者所呈國書中其君尚只自稱「日出處天子」，如果當時已改國名，自然會自稱日本天子。因此，他認為，當時尚未改變國名，不過想與隋朝平起平坐的願望已經充分顯露，所以也可說這是準備更改國名的先聲。這樣，作者雖然未確指倭國改名日本的具體年代，但是已經基本上可以確定那是在公元七世紀中期了。

順便說明，作者還告訴了我們一個有趣的道理：倭國改名日本，是為了倭字不雅，改名日本才可以擺脫掉對中國的某種順從地位（按，《說文解字》云：「倭，順貌，從人委聲」。段玉裁注云：「倭與委義略同。委，隨也。隨，從也」。）可是，他們發現了或懂得了倭字還有不雅的意思，那只是到了隋唐時期在文化上接受了中國更深的影響以後。其實，倭的稱呼其音也來自倭國自己，倭國改名日本以後，中國史書也就改稱之為日本了。

四、由於《日本書記》始終沒有說倭國改名日本的事，這就使得改名說總是立足不穩。作者在精研《日本書記》以後，終於發現在這部成書較晚因而只具有第二手史料價值的書中還以引證文獻的方式保存了一些第一手史料，恰恰在這些第一手史料中就有日本確實曾經稱倭的證據。

例如，《日本書記》卷二十六正文下的注裡，保存了公元六五九年日本遣唐使伊吉連博德所寫的在唐朝參加冬至朝會的回憶錄：「十一月一日，朝有冬至之會……所朝諸蕃之中，倭客最盛。」這是日本使者自己稱倭客的實證。又如，此書記載了公元六〇八年隋朝皇帝的國書，其中寫道：「皇帝問倭皇。」這是當時日本仍稱倭的又一證據。又如，此書記載了公元六四七年（大化元年）孝德天皇的詔書，其中追述佛教傳入的時候說：「於城宮禦宇天皇（欽明）十三年中，百濟明王奉傳佛法於我大倭。」（第二二二頁）既然國君詔書中都有自稱大倭的字樣，當然日本曾經自稱倭國就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正是經過這樣的論證，作者敢於斷言，日本的確曾經稱倭。

這無疑是一部史料征引詳贍的書，但又不僅限於所引史料數量之多，值得指出者，尤為作者徵引史料的審慎與精思。他從縱的方面注重所引史料在時間上的連貫性，如他引《漢書》以下各正史直至舊、新兩《唐書》，必使其中間斷可疑之處，此其特點之一。他又從橫的方面注重中、朝、日三國史料之間的契合性，如他不僅引用中方史料，而且以朝鮮《三國史記》以及日本的《日本書記》等書，以作比勘佐證，必使其相互印證而無疑，此其特



點之二。作者又注重對於史料本身作層次之分析，力求以第一手史料來印證或否證第二手史料的真實性。以好大王碑文及《三國史記》中所引原始文獻以印證《三國史記》其他關於倭國的記載，是其以第一手史料證實第二手史料之例；以《日本書記》之所引原始文獻中確有稱倭與以大倭自稱之事例，揭示日本並非如《日本書記》所說一向即以日本為名，是其以第一手史料證 第二手史料之例。於此吾人可見作者於史料之引用既博且精，足徵其作為史學家之深厚之功力。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此書作者不但於史料考證方面用功甚勤，而且在總體論證中又十分注意邏輯結構之嚴謹。作者所要證明的命題是，日本始有文字記載之信史自中國之《漢書》始。而《漢書》所載為倭而不曰日本，故必證明《漢書》中之倭即今之日本之前身，然後作者所提之假設始能成立。

作者首先證明《漢書》中所說之倭（今之為A）即《隋書》中裴世清所使之倭與《舊唐書》中高表仁所使之倭（今之為B），又《日本書記》等六部國史中所說之日本（今之為C）即為今日日本（今之為D）之前身，此為不須證明之事實，故作者著力證明裴世清、高表仁先後訪問之倭即是《日本書記》所記他們訪問的日本。前已知A=B，又已知C=D，如今



作者既證明B=C，則A=D，已無可疑。作者就是這樣以近乎幾何學的方法證實《漢書》中所說

之倭即今日日本之前身的。

因此，我以為，這一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是重要的，作者在史料考據之精博與邏輯論證之謹嚴上皆可說是很出色的。這一本書本身無疑是具有其嚴肅的學術價值的，而且這一本書，如果稍稍細讀一下，對於年輕一代的史學研究者來說，可能還具有治史方法方面的啟發作用。

（原載《讀書》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 附錄二：嚴謹而謙和的 治史大師—— 史學系教授陶天翼榮退

林子詩

## 陶

天翼爺爺深受學子愛戴，他的退休讓許多同學感到不捨。「如『天』空中的大鵬鳥，張開厚實的羽『翼』隨風而起，貼著青天，直上九萬里高空」，是今年即將從文大史學系退休的教授陶天翼，其父親陶百川（已故中央日報社長）深深的期許，鼓勵他成為一位不斷挑戰人生極限學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及文化系博士畢業的陶天翼教授，是一位治學嚴謹且溫厚謙和的長者。史學科班出生的他，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七十多年來，累積了非常渾厚且極具深度的見地及智慧。

在陶教授的著作，《太平天國的「都市公社」》、《考績源起初探——東周迄秦》、或正在著手撰寫的《漢朝政府用人》等史學論著，都可以反映出陶教授「以史為鑒而知興替」的史學思維。

出生於上海，民國三十八年隨國民政府軍來臺，八十八年從夏威夷大學轉任文大史學系的陶天翼教授，一直過著「以校為家、以書為友」的學術生活。陶教授說，「學生，是他一輩子的朋友」。在文大四年教學的生涯中，陶教授和校園裡的學生、同事、餐館的老闆及員工，結下了無法言欲的情感。每當他到文大附近餐館用餐時，他會關心周圍的學生吃飽了沒；遇到熟悉的學生，他就慷慨地請他們吃飯。他體恤餐館老闆及員工的辛勞，常常貼心地幫忙維持餐廳環境的整潔。

有別於待人的謙和及寬容，陶教授對於學術及教學品質的追求，可說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無論是考試、讀書、教書，陶教授都會事先畫好整密且嚴謹的架構。他將其嚴謹治學的態度，付諸於學術上的實踐。「我教書都是很有計畫，且花很多心思在



事前的組織架構上，所以每當上完課後，我都非常滿意自己的表現」，陶教授說。

今年退休的陶天翼教授，將於八月前往擁有豐富史學資料庫的美國夏威夷大學進行學術研究，致力於「中國史料」及「漢朝政府用人」方面的史料撰寫，繼續將中國的歷史成就發揚光大，成為現今社會體制能運用且借鏡的素材。

陶天翼教授的著作有：《太平天國的「都市公社」》、《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1850-1864): A Police State, A Reign of Terror》、《考績源起初探——東周迄秦》、《日本信史的開始——問題初探》、《Yen t'ieh lun (鹽鐵論 Discourse on Salt and Ir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漢簡裡所倖存的政府人事檔冊》、《政府用人的制度化——以西漢選用丞相為例釋同產》、《前漢控制皇帝這個禍患的一點嘗試：天譴天奪》、《前漢的試守制度》。

（原載《華夏導報》二〇〇四年六月九日）



# 附錄三：人物側／速寫

## 陶天翼教授

kurogami (蒼翼黑狼)

這

些新聞只是稍微說明一下「他是誰」，卻不一定就是我認識陶教授。

學校實踐了文史哲一家的精神，三系系館都在大典，課程的安排也都在大典跟大恩為主。課堂間的來往交錯，我常有機會看見這位教授。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一頭蒼蒼白髮底下卻總是有著紅潤的笑顏。「鶴髮童顏」就是他容貌的最佳寫照。不僅外表如同肯德基爺爺一樣慈祥，連個性亦如是——我雖然不是他的學生，卻也從沒見過他皺眉頭。

課後我都在學校附近吃飯。時常看見他也在學生餐廳吃飯，偶爾也看見跟幾個學生一起吃，不過更多的時候常看到他自己獨個兒吃。

飯後或者課餘，我常看見他徜徉在校舍之間。也許拄著柺杖走著。也許坐著打著盹，也許眯著眼睛看著天空。也許在大雅美食廣場的樓梯上，也許在百花池的桌椅上。總著一件短衫的他，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替他擔心著涼。

大二一個微涼的午後，我又看見他一個人在百花池打著盹，看著風。我終於按耐不住滿腔的好奇心，上前找了他談話。

「教授好，我是文藝組的學生。您沒教過我，不過我常看見您在學校出現，想跟您聊個天，不知道方不方便？」

「好啊，有什麼不好？」教授微笑著說。於是我知道了，他本來在美國夏威夷教書，為了照顧父母親而回來臺灣。

他「輩子沒結過婚。「不會寂寞嗎？」我問。「怎麼會呢？要做的事情很多呢。我現在在寫一部書，還怕來不及寫完呢。」

「有沒有想過養些個小貓小狗的？」很多老人家都是這樣排遣寂寞的。

「怎麼會寂寞呢？我就住學校（他指了指大莊館），沒事就看書寫書，悶了煩了就像出來透透氣，吹吹風。」

說著，他的眼光又飄的好遠，好遠。然後我們就靜靜的在那邊吹著午後的涼風。偶爾會有幾個學生經過，他也微笑著舉手，打招呼。

時間差不多了，於是我向他道了別，繼續踏上自己該走的路。

但是那場邂逅並沒有這麼結束。巧的是，大二下他似乎住到我家樓下了。總在吃飯或洗衣服的時候跟他擦身而過。也許在大廳打聲招呼，也許一起在電梯裡寒暄。

他出門不帶鑰匙的。管理員看到他會很熱切的幫他服務，跟他寒暄，叮囑他太晚了不要出門等等的。

而有時我們提著一大籃衣服要去洗時，總看到教授就用手拿著一兩件襯衫跟褲子，也沒加洗衣粉什麼的，就這麼投進去洗。

有一次更有趣。當晚樓下電被切了，錢投下去洗衣機卻沒有動。沒法子，我們得等隔天管理員來了才能用。隔天我們去找管理員時，他卻交給我們四十元，說：「那個教授交代說他要洗的時候發現裡面有人投錢了，這些錢就還給那些人。那些衣服是你們的吧？」說著，他比了旁邊那一堆髒衣服。對，是我們的。「那這就還給你們了。」正說著，他把錢遞給我們的時候，教授吃過早餐回來了，跟我們微笑著打過招呼。進了電梯上樓了。

其實有時候八點的課提早出門時，我也看見教





二〇〇四年六月陶天翼於中國文化大學榮休之際與學生合影

授在附近賣蛋餅油條豆漿的中式早餐店，一邊吃著一邊還跟店家和藹的聊著。

其實那時候我想，如果這種人是我的長輩，我當他兒子養他都心甘情願。現在他回去了，我來不及送他一程，總感覺有些遺憾。

日）  
（原載部落格：黑小狼的小說本子，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



二〇〇三年四月於臺北中國文化大學